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关键词:冯契;智慧说;古今中西之争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3.001

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

——“智慧说”及其意义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中国哲学的演化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和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学的意义。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既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展开为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既成性,后者则赋予中国哲学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延伸和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当代并没有终结。作为创造性的哲学系统,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便可视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形态,这种哲学的形态,同时呈现了内在的世界意义。

不同的哲学传统蕴含不同的哲学进路和趋向,这是历史的实然。在哲学进路分化的格局下,治哲学者往往不是归于这一路向就是限于那一路向,不是认同这一流派,就是执着那一流派,由此形成相互分离的哲学支脉,在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的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现象学之中,便不难看到这种哲学趋向。与之相异,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更多地表现出兼容不同哲学进路的视域。通过对不同哲学进路的范围进退,以彼此沟通、融合的眼光去理解被分离的哲学问题,“智慧说”在努力克服当今哲学研究中各种偏向的同时,也在哲学层面展现了其世界性的意义。

进而言之,冯契在扬弃不同的哲学进路、展现世界哲学的眼光的同时,又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建构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也就是说,他不仅从方式上扬弃不同的偏向,而且在建设性的层面,提出了自己

的哲学系统。后者具体体现于其晚年的“智慧说”之中。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认为在中西思想相遇后,不能再执着于中西之分。从近代哲学思想的演化看,冯契进一步将“学无中西”的观念与世界哲学的构想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自身具体的哲学思考,努力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后者既以理论的形式实际地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形态融入世界哲学之中。

就哲学思考的目标而言,冯契所指向的是“智慧”的探索。这一哲学追求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19世纪以来的哲学的演进。

19世纪至20世纪,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先后成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尽管二者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呈现出某种将哲学技术化、知识化的倾向。实证主义首先关注经验以及逻辑,并以类似科学的把握方式为哲学的正途;分析哲学则把语言作为唯一的对象,以对语言的技术化分析取代以真实的存在为指向的智慧追问。借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智慧的探索以“道”的追问为指向,以上趋向则执着于知识性的进路,以“技”的追寻拒斥“道”的追问。这种由“道”而“技”的进路,在实质的层面蕴含着智慧的遗忘。

与智慧的遗忘相辅相成的,是智慧的思辨化、抽象化趋向。从20世纪以来的哲学看,现象学在这方面呈现比较典型的意义。相对于分析哲学,现象学不限于对经验和语言的关注,从胡塞尔追求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到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都体现了以不同于知识的方式理解存在的要求,其中同时也蕴含了智慧的追问。然而,另一方面,以“纯粹自我”、“纯粹意识”为哲学大厦的基础(胡塞尔),专注于“烦”、“畏”等“此在”的感受(海德格尔),又明显地表现出思辨构造或抽象化的趋向。

相对于当代哲学中智慧的遗忘这一偏向,冯契的思考表现出不同的哲学走向。他不仅在哲学旨趣上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保持了某种距离,而且通过数十年的智慧沉思,形成了以《智慧说三篇》为主要内容的智慧学说,从而以实际的哲学建构克服了对智慧的遗忘。

在超越智慧遗忘的同时,冯契对智慧的抽象化趋向同样给予了自觉的回应。上承马克思的哲学,冯契把实践的观念引入哲学的建构,并将自己的“智慧说”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在这样的视野之中,智慧所探寻的不再是抽象的对象,而是现实的存在。所谓现实的存在,也就是进入人的知行过程、与人的知行活动无法相分离的具体实在。智慧说的主干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里的“世界”区别于本然的、玄虚的对象而展现为真实的存在,“自己”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而是表现为现实的个体。质言之,作为智慧追寻对象的存在,无论是世界,抑或自我,都是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真实存在,这一视域中的存在既不同于本然之物,也有别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超验对象。就以上方面而言,“智慧说”同时表现为对智慧抽象化的超越与扬弃。

可以看到,冯契一方面以智慧的追寻、智慧学说的理论建构克服了智慧的遗忘;另一方面又把智慧的探求放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由此扬弃了智慧的思辨化、抽象化趋向。冯契对当代哲学中智慧遗忘与智慧抽象化的双重扬弃,内在地呈现了世界哲学的意义。

在冯契那里,作为智慧追寻结晶的“智慧说”,同时又体现于广义认识论之中,广义认识论可以看成是其“智慧说”的具体化。在冯契看来,认识论需要讨论四个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属一般认识论或狭义认识论讨论的对象,后两个问题则不限于一般所理解的认识论,而涉及形上智慧与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对认识论的如上理解与通常对认识论的看法不同。如果我们把通常形态的认识论看作狭义认识论,那么,包含形上智慧与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如何培养问题的认识论,则可理解为广义认识论。从哲学演进的层面看,冯契对认识论的这种广义理解,包含多方面的意蕴。

在广义形态下,形上智慧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是如何理解存在的原理,在此意义上,广义认识论同时需要考察和讨论本体论的问题。进一步看,在广义认识论中,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彼此相通: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便涉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自身人格的培养,后者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也就是成就自己。成己(成就自己)的前提是认识人自身:如果说,对具体对象及形上智慧的把握涉及认识世界的问题,那么,自由人格的培养便更多地和认识人自身相联系。在冯契看来,广义的认识论即表现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统一。具体而言,认识过程不仅仅面向对象,而且也是人自身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所谓从自在到自为,也就是人从本然意义上的存在,通过知行过程的展开,逐渐走向具

有自由人格的存在。成就自己(理想人格的培养)同时涉及价值论的问题:人格的培养本身在广义上关乎价值领域,理想、自由等问题也都是价值领域讨论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认识论问题又与价值论问题相联系。如果说把形上智慧引入认识论中,意味着肯定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的联系,那么,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沟通以及由此引入“成己”的问题,则进一步把认识论问题和价值论问题联系在一起。

把认识论的问题和本体论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进路包含多方面的涵义。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不同于对知识的狭义考察;从本体论角度看,它又有别于思辨意义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趋向在于离开人自身的知、行过程去考察存在,由此往往导致对世界的思辨构造:或者把存在还原为某种终极的存在形态,诸如“气”、“原子”等等,或者追溯终极意义上的观念或概念,由此建构抽象的世界图景。与完全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去思辨地构造存在模式的这种传统形而上学不同,冯契对本体论问题的考察始终基于人自身的知行过程。

以上主要着眼于关联认识过程的本体论。从认识论本身看,广义认识论又不同于疏离于本体论的知识论,而是以本体论为其根据。自分析哲学兴起以来,当代哲学对认识论的考察,往往主要以抽象形态的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为进路,冯契则不主张仅仅把认识论(epistemology)归为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知识论的进路每每回避了对世界本身的把握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回避背后常常隐含着消解客观性原则的趋向,后者较为明显地呈现于当代认识论的传统,从所谓观察渗透理论,到拒斥真理的符合论,都不难看到这一点。观察渗透理论本身无疑不无合理之处:它注意到观察过程中并不仅仅包含感性活动,其中也渗入了内在的理论视域。然而,在当代的知识论中,观察渗透理论着重突出的是人的主观背景对认识过程的作用,包括认识者所具有的观念框架对其进一步展开认识活动的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突显了认识过程中的主观之维。在真理问题上,当代知识论往往趋向于否定和批评符合论。符合论根据认识内容和认识对象是否符合,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这种理论本身的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内在问题,无疑都可以讨论。但肯定认识和对象的符合,同时隐含对认识过程客观性的追求,拒绝这一追求,则意味着对客观性的疏离。

在另一些哲学家如哈贝马斯那里,主体间关系往往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哈贝马斯注重共同体中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强调通过以上过程达到某种共识,其所关注的主要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讨论和对话,后者在认识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冯契也非常注重这一方面,他把群己之辩引入认识过程中,所侧重的便是不同主体间的交流、讨论对认识过程的意义。但是,冯契同时又肯定不能以主体间性拒斥客观性。从逻辑上看,仅仅关注主体间性,认识每每容易限定在主体之间,难以真正达到对象。在疏远、忽略客观性方面,单纯强调主体间性与前面提到的仅仅注重主体性,显然有其相通之处。

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哲学演化的趋向之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彼此相分,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客观性原则”的拒斥。与这种哲学趋向相对,在“广义认识论”的主题之下,冯契强调:“认识论和本体论两者互为前提,认识论应该以本体论为出发点、为依据。”这一观点明确肯定了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的联系。按冯契的理解,认识论不能像分析哲学中的一些知识论进路那样,仅仅封闭在知识领域中,关注于知识形态的逻辑分析,而不问知识之外的对象。在此,冯契的侧重点在于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由此重新确认认识的客观性原则。从肯定“所与是客观的呈现”,到强调认识过程乃是“以得自现实之道来还治现实之身”,认识的客观性之维在不同层面得到了关注。宽泛而言,认识过程就在于通过知行活动作用于现实,由此把握关于现实本身的不同规定,形成合乎事与理的认识,然后进一步以此引导新的认识过程。在这里,客观性首先体现在认识的过程有现实的根据,引而申之,概念、命题、理论作为构成知识形态的基本构架,也有其本源意义上的现实的根据,而非思辨的构造。

通过确认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肯定认识过程中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不可相分,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既扬弃了近代以来认识论隔绝于本体论、能知疏离于所知等立场,也超越了仅仅强调认识领域的主体性、主体间性而排拒客观性的趋向。

综合起来看,就其联系人的知行过程考察存在而言,广义认识论可以视为基于认识论的本体论;就其以本体论为认识论的出发点而言,广义认识论又表现为基于本体论的认识论。进一步看,在广义认识论中,对自由人格(理想人格)的把握,同时展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看作是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相互统一的展开。在这里,广义认识论之“广”,即展现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的统一,后者既是“智慧说”的具体化,也是对近代以来认识论趋向于狭义知识论的回应。

作为“智慧说”的体现,广义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其中包含形上智慧的探索和追寻。形上智慧本身既涉及是否可能的问题,也关乎“如何可能”,二者构成了转识成智的相关问题。冯契首先提出理性直觉和辩证综合,以此沟通了转识成智过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逻辑分析和辩证思维。

进一步看,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同时又与智慧的实践向度联系在一起。智慧的实践向度首先体现于冯契所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两个著名观念。理论既得之现实,又还治现实,所谓“化理论为方法”,主要与人作用于对象的过程相联系:广义上的方法既关乎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也涉及对事物的作用,二者都离不开实践过程。“化理论为德性”,则体现于人自身的成长过程,其形式表现为以理论引导实践过程,由此成就人的德性。以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以上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成己与成物。形上智慧来自实践过程又进一步运用于实践过程;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形上智慧既落实于现实,又不断获得新的内容,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

正是基于“转识成智”的实践之维,冯契在肯定理性直觉、辩证综合的同时,又提出了德性自证。德性自证侧重于在实践过程中成就自我,它既涉及凝道而成德,也关乎显性以弘道。如果说,理性直觉、辩证综合较为直接地与智慧的理论意义相涉,那么,德性自证则更多地突显了智慧的实践意义。在变革世界的过程中成就自我,同时从实践的层面为“转识成智”提供了现实的担保。

对“转识成智”的如上理解展现了走向形上智慧的多重方面。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沟通、过程和飞跃的统一中,交错着逻辑分析和辩证综合之间的互动,德性自证则进一步使智慧的实践意义得到彰显。通过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以实现转识成智,不仅是主体走向智慧的过程,而且也是智慧现实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冯契的以上看法既体现了对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具体思考,也从更深的层面上展现了对智慧遗忘与智慧思辨化的超越。

智慧的探索始终关联着意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在20世纪哲学中,分析哲学关注于语言的问题,但同时又表现出限于语言之域的倾向;现象学则对意识作了更多的考察,但又表现出意识的思辨化、先验化的倾向。以智慧的追寻为进路,冯契对语言、意识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这种考察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意、道之辩,又参与了当代哲学关于语言、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通过区分语言意义与语言的意蕴、重建语言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冯契从不同方面对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作出了理论回应;通过精神本体的祛魅、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和成己与成物为精神及其活动的实质指向,冯契则展现了心物之辩的当代视域。名实、心物问题上的这种论辩既具体地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也从更内在的层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回归智慧的哲学趋向。

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

——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契先生担任华东师大政教系主任的时候,学校中北校区的地理馆的333教室,是政教系的最重要

*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冯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主旨发言稿。